

# 从“抚纳氐羌”到控御秦州： 东羌校尉与魏晋陇右政局

丁树芳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摘要:**东羌校尉是魏晋以来中原王朝设立军府统治陇右氐、羌之首例,其设立及发展,与魏晋陇右政局关系密切。三国时期魏、蜀陇右之争,促使曹魏设置此官招附陇右氐、羌,争取他们对魏军陇右防御战的支持。西晋设立秦州后,东羌校尉在履行治理陇右氐、羌的基本职能外,进一步涉入秦州地方政治。特别是在西晋后期,东羌校尉作为隶属秦州的重要军事武力为各方势力竞相利用,在夺取秦州控制权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东羌校尉;陇右;秦州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5)02-0144-05

## From Administrating the Di and Qiang to Controlling Qinzhou: Dongqiang Xiaowei and the Situation of Longyou in the Wei and Western Jin Dynasties

DING Shu-fang

**Abstract:** Dongqiang Xiaowei (东羌校尉) was the first military officer position established to administrate the Qiang (羌) and Di (氐) ethnic groups in Longyou (陇右) area by the Wei and Western Jin Dynasties. It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Longyou area in the Wei and Western Jin. The struggle for Longyou between the Wei and Shu Kingdoms gener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position to convene the Qiang and Di to support the defensive warfare for Longyou by the Wei Kingdom.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Qinzhou (秦州) by the Western Jin, Dongqiang Xiaowei further participated in the local politics of Qinzhou, except for administrating the Qiang and Di. Especially in the late Western Jin, Dongqiang Xiaowei, which was the vital military strength subjected to Qinzhou,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seizing the power of Qinzhou.

**Key words:** Dongqiang Xiaowei; Longyou; Qinzhou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常以校尉官为“持节使者”来“领护”特定的少数民族,以实施对边境少数民族的军事管理。此类职官在汉代主要有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西域都护<sup>①</sup>等,为便于行文,姑且统称此类职官为“持节领护”校尉。曹魏时设置的东羌校尉即属“持节领护”校尉官的一种,是魏晋以来中原王朝设立专职校尉官管理陇右氐、羌的首例。西晋沿置东羌校尉,并在其管辖的陇右地区设置州级行政区划——秦州,使东羌校尉成为秦州的重要军事武力,不仅在治理陇右氐、羌和平定河陇民族叛乱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对晋末陇右政局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有关东羌校尉的记载较少,且散见于史书之中,致使目前有关该职官的研究仅为概要性的介绍,缺乏全面系统的深入探究。本文拟在魏晋时期陇右军事、政治、民族与地理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考察东羌校尉的设置原因、职能及其对西晋陇右政局的影响,以期深化对这一

职官的认识。

### 一、招附氐羌:曹魏东羌校尉设置考

#### (一)汉魏之际的东羌与氐人

以职事命官,是中国古代职官命名的重要原则。<sup>②</sup>就官名而言,东羌校尉职在掌管东羌民族事务。东羌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的一支,主要指分布在安定以东,包括西河、上郡、北地等郡的羌人。<sup>③</sup>他们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以部落形态居于当地,由于没有出现强有力的羌豪,各部落之间不相统一。在匈奴统治蒙古草原时,他们从属于匈奴;在匈奴衰落后,东汉朝廷征发他们为骑兵参与作战。直到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先零别种滇零据北地反叛,他们才因响应滇零反叛而崭露头角,为史籍所记载。<sup>④</sup>此后东羌或与南匈奴、西羌联合反叛,或独举叛旗、频发动乱,使并、凉虚耗,

收稿日期:2015-01-02

作者简介:丁树芳(1986-),女,安徽安庆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朝廷为忧。至灵帝初年,东汉终于决心剿灭东羌。建宁元年(168年)春,护羌校尉段熲于安定高平大破先零羌,斩首八千余级。夏,复追剿先零羌,羌余部四千落悉散入汉阳山谷间。二年(169年)春,段熲又于汉阳大破散羌,东羌悉平。谒者冯禅招降东羌四千人,分置于安定、汉阳、陇西三郡。<sup>[1]</sup>自此东羌的分布范围自安定以东,西迁至以陇山、六盘山为中心的汉阳、陇西各郡。

管理东羌民族事务的东羌校尉,始见于曹魏甘露元年(256年)。其年,安西将军、领护东羌校尉邓艾大破姜维于南安、天水两郡。<sup>[2]</sup>南安郡,《秦州记》载乃中平五年(188年)分汉阳郡所置。<sup>[3]</sup>天水郡,即东汉汉阳郡,曹魏复其旧名。<sup>[4]</sup>由此可见,甘露元年东羌校尉邓艾活动的南安、天水两郡,就在东汉冯禅安置东羌降众的汉阳郡范围内。正是由于自汉末以来,相当数量的东羌被迁徙至这一地区,曹魏才于此地始置东羌校尉,加强对东羌余部的管理。这一时期除东羌外,以陇山、六盘山为中心的地区也是氐人盘踞之地。汉代氐人主要分布在武都郡,故有“武都氐”之号。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为

阻止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命雍州刺史张既迁武都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这是氐人人居陇右、关中之始。<sup>[5]</sup>从武都郡北徙至扶风、天水的氐人共五万余落,以一落五口计,则有二十万之众,若均而论之,迁至天水的氐人恐有十万之众。延康元年(220年)七月,又有“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复居天水郡。<sup>[6]</sup>汉魏之际武都氐两次大规模北徙,使天水郡成为氐人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设置于此地的东羌校尉在管理东羌的同时,也兼领天水郡的氐人部落,当为题中应有之义。这与东汉时护乌桓校尉同时兼领人居东北边郡的乌桓、鲜卑部落的状况是类似的。<sup>[7]</sup>

## (二)东羌校尉设置与魏、蜀陇右之争

管理陇右地区的东羌与氐人部落,固然是曹魏设置东羌校尉的主要原因,但这一时期魏、蜀争夺陇右也是影响东羌校尉建置的关键因素。自太和二年(228年)至青龙二年(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对曹魏进行了长达七年的北伐。主要战事过程如下表所示:

时间	战事
太和二年(228年)正月	诸葛亮攻占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右将军张郃大破亮于街亭,亮败走,三郡平。
太和二年(228年)十二月	诸葛亮围陈仓,为将军费曜等拒之。
太和三年(229年)春	诸葛亮攻占武都、阴平二郡。
太和五年(231年)三月	诸葛亮寇天水,大将军司马懿拒之。七月,粮尽退军。
青龙二年(234年)四月	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懿率军拒之。不克退走。

诸葛亮五次北伐的地点依次为天水、南安、安定、陈仓、武都、阴平、渭南,除第二次战场在陈仓、第五次战场在渭南以外,其余皆在陇右地区。即便第二次和第五次北伐没有直指陇右,其进军目标亦在切断陇右与关中的联系,达到孤立陇右以伺机夺取的战略意图。正如梁满仓先生所言,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标就是攻占陇右,进而占有关中,配置起两路进攻中原的西路钳臂。<sup>[8]</sup>

诸葛亮卒后,姜维在继承其陇右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蜀汉北伐的目标由陇右腹地,西进至洮水及湟水流域的羌中地区。姜维出身于氐、羌聚集的天水郡,对氐、羌风俗颇为练达,使他在北伐过程中,较为重视氐、羌部落对陇右战局的影响,认为若诱使陇右“诸羌、胡以为羽翼”,“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sup>[9]</sup>。面对蜀汉招诱氐、羌,大举进攻陇右腹地的形势,曹魏势必要加强对该地的军事防御。而盘踞陇右的氐、羌部落之向背正是左右魏军在这一地区防御实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曹魏亟需在陇右地区设置东羌校尉镇抚氐、羌各部,以防止他们倒入蜀汉阵营,掣肘魏军对陇右的军事防御。

此外,募集氐、羌族兵加入魏军,为陇右防御战提供直接的武力支持也是曹魏东羌校尉的主要战略目标。征发羌、胡兵众及部落车、马、牛、羊等物资以为军实,是蜀汉北伐战争中物质力量的来源之一。《汉晋春秋》载太和二年(228年)十一月诸葛亮上表中,透露其北伐军中有“賸、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sup>[10]</sup>。太和三年(229年)诸葛亮夺取武都、阴平二郡,也有赖于二郡氐、羌的降集。等到更具招诱氐、羌能力的

姜维主政蜀汉时,“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氍毹及义谷神军粮,国赖其资”<sup>[11]</sup>。蜀汉诱使羌胡部落为蜀军提供兵力支持及战争物资,占据氐、羌盘踞之地的曹魏也应当在军事防御中采用这一方略。因其募集兵力及物资的对象是氐、羌等少数民族,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及其后羌胡兵的统率、役使显然当由东羌校尉负责。甘露元年东羌校尉邓艾于上饼大破姜维军,虽然史籍对于此役邓艾是否统率羌胡兵参战没有明确记载,但其后在景元四年(263年)曹魏募集“羌胡健儿”,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为自阴平小道突入蜀汉提供了重要的武力支持。<sup>[12]</sup>伐蜀的“羌胡健儿”达五千余人,几占伐蜀总军力的四分之一,又因羌人英勇善战、熟悉地形,当是伐蜀大军中的精锐部队。曹魏将这支部队授予邓艾,可能与他在担任东羌校尉时曾率领氐、羌兵众对蜀作战有直接关系。

## 二、设立秦州:东羌校尉涉入陇右政治之前提

魏晋递嬗后,西晋沿置东羌校尉。与曹魏时期东羌校尉的信息在文献中极为贫乏相比,这一时期东羌校尉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及陇右地方政治上有着较为活跃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晋末陇右政局的发展。这证明西晋东羌校尉不是魏东羌校尉的简单延续,而是被赋予了与前代相异的历史使命。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晋秦州设立,及其所导致的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相配合,共同管理陇右军政、民族事务体制的成立。

以山川为界来划分政区是世界各文明古国的通行原则。<sup>[10]</sup>陇右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在此地建立独立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盖其地……自古用武之国也。……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成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会而河、湟之要领举”<sup>[11]</sup>,具有很高的军事战略价值,周人兴起、秦人伐戎、隗嚣割据、魏蜀鏖战都发生在这一地区。然而陇右政区的建立过程却非一帆风顺。魏文帝即位,“分陇右为秦州”<sup>[12]</sup>,虽开启了在陇右设置州级行政区划的先河,但不久即罢,存在时间非常短暂。<sup>③</sup>至西晋初年,秦州建制仍然处于废罢无常的状态。以下对西晋秦州废置历程及秦州诸郡建置分合略作考察。

《晋书·武帝纪》载泰始五年(269年)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陇西、天水、南安、略阳、武都)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sup>[13]</sup>。此次置州的缘由,主要在于防备河西鲜卑叛乱。鲜卑人居河陇,始于曹魏后期“邓艾纳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sup>[14]</sup>。至西晋初年,河西鲜卑蠢动不休,引发朝野不安。因此泰始四年(268年)御史中丞傅玄建议“更置一郡于高平川”,以防止鲜卑在安定、武威间的广大区域中有“窟穴浮游之地”,并使安定、武威“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sup>[15]</sup>。可见泰始五年秦州的设立及其属郡的配置都是为了防备鲜卑等少数民族动乱,以稳定河陇地区。而且陇右沟通雍凉,南接巴蜀,出于日后顺江东下灭吴的需要,西晋对于巴蜀西北的门户——秦陇地区也需特别重视。

晋初纳入秦州范围的除雍州陇右五郡外,尚有凉州金城和梁州阴平二郡。山口洋先生认为纳入金城郡,是考虑自然地形结果<sup>[16]</sup>,但对阴平纳入秦州的原因却未论及。阴平郡,与陇西、武都郡接壤,地理上紧邻陇右地区。王夫之《读通鉴论》云:“天水、南安、安定,地险而民强,诚收之以为外蔽,则武都、阴平在怀抱之中”<sup>[17]</sup>。东汉中叶,武都太守虞詡“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sup>[18]</sup>,再向西南可至阴平,密切了阴平与陇右的交通联系。阴平又“多氐僊。有黑、白水羌,紫羌,胡虏”<sup>[19]</sup>,是氐羌聚结之地。鉴于汉魏之际氐、羌叛乱不止的形势,将邻近陇右的阴平郡纳入秦州有助于加强对当地氐、羌的控制。

太康元年(280年)平定河西鲜卑动乱后,河陇局势日渐稳定,晋廷设立秦州的初衷已不复存在。同时,由于西晋平吴完成统一,巴蜀地区的战略优势陡然丧失,巴蜀西北的门户——秦陇地区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这对原本就并不稳固的秦州建置更是雪上加霜。全国统一使西晋具备了“偃武修文”<sup>[20]</sup>的条件,加上“州郡兵”制带来的地方势力过大的弊端日益显现,至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决定“罢州郡兵”。<sup>④</sup>虽然罢州郡兵不等于罢州,但秦州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出于战略目的的需要而设,一旦战略达成失去存在的价值。“罢州郡兵”的改革措施是为了避免地方势力的坐大,对一般的州郡来说是罢兵,但对于秦州这样失去价值的新州可能会上升为罢州。在这一背景下,西晋于“太康三年,罢秦州”<sup>[21]</sup>。

秦州被废后,各属郡还归雍、凉、梁三州。金城入于凉州,陇西、南安、天水、略阳还于雍州,阴平、武都入梁州。秦州属郡大半并入雍州,使雍州人口猛增。据《晋书·地理志》,雍州

有户九万九千五百,陇西、南安、天水、略阳四郡有户两万五千一百余。<sup>[22]</sup>四郡并入后,雍州应有十二万余户。太康七年(286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余万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sup>[23]</sup>。“萎莎胡,北狄种,盖亦匈奴类也”<sup>[24]</sup>。这十余万口匈奴人居雍州,不仅加剧了雍州的人口压力,也增加了当地的不安定因素。客观上要求增设政区,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其次,西晋“罢州郡兵”的措施在施行上遭遇了重重阻力,不得不逐步削弱改革力度,朝着由“普罢”到“普减”,再到原封不动的道路变异<sup>[25]</sup>,这为秦州的复置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形势。至太康七年秦州“复立,镇上餠”<sup>[26]</sup>。与泰始年间相比,复立后的秦州属郡配置发生了变化,凉州金城郡未再并入。金城为河西雄郡之最,“介戎、夏之间,居噤喉之地,河西、陇右安危之机,常以金城为消息”。<sup>[27]</sup>泰始年间,将金城郡并入秦州,是为了在自然地形上将整个乌鞘岭以东地区纳入秦州地域,防止鲜卑有东西流窜之地。但太康年间,河陇地区局势稳定,故金城郡未再并入。

经过太康七年的复立,秦州最终稳定地成为西晋州级行政区划之一。秦州之立,使掌管陇右氐、羌的东羌校尉被纳入秦州地方职官系统中,东羌校尉所领府兵也成为秦州的重要军事武力。惠帝“元康中,护羌校尉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sup>[28]</sup>,确立了“持节领护”校尉与州刺史兼领的制度。受此制度的影响,东羌校尉开始与秦州刺史兼领,使它在履行管理陇右氐、羌这一基本职能的同时,进一步涉入陇右地方政治,宣告了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共同管理秦州军政、民族事务体制的成立。

### 三、镇抚与争夺:东羌校尉与西晋陇右政局

#### (一)西晋前期东羌校尉镇抚陇右氐、羌

西晋前期,影响河陇政局甚巨者莫过于以河西鲜卑为首的少数民族叛乱。作为陇右地区执掌民族事务的军事职官,东羌校尉积极讨伐叛乱,以维护地区稳定。在泰始五年河西鲜卑叛乱方兴未艾之际,晋廷即于陇右置秦州,又以“素有恩信于西方”<sup>[29]</sup>的胡烈出任秦州刺史兼东羌校尉<sup>⑤</sup>,旨在依靠胡烈的军事才能,制御“诸胡”,遏止叛乱。泰始六年胡烈败死万斛堆后,陇右东羌、鲜卑相率应叛,严重威胁秦州安危。为迅速平叛,朝廷在秦州首次设置都督区,以增强秦州的军事防御力量,又以杜预继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负责讨叛事宜。杜预是西晋名将,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通过对敌我形势的缜密分析,认为“虏乘胜马肥,而官军乏”,故不应急于出兵,“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但由于秦州都督石鉴与杜预有“宿憾”,加之二人在进兵时机上存在意见分歧,致使在平叛初期秦州就发生都督与东羌校尉的内斗。因石鉴弹劾,杜预被“征诣廷尉”,他提出的“须春进讨”鲜卑的良策也就未能在平定陇右叛乱上发挥有效作用。<sup>[30]</sup>

惠帝元康年间,西北少数民族叛乱再度波及秦州。《华阳国志·后贤志》载,何攀在诛太傅杨骏后不久,“转东羌校尉。西虏寇边,遣长史杨威讨之,违攀指授,失利。征还,……武库灾,百官皆[救]赴火。”<sup>[31]</sup>案杨骏之诛,在元康元年(291年)三月;

武库火,在元康五年(295年)十月,可知何攀担任东羌校尉的时间在元康元年三月至元康五年十月间。考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少数民族叛乱唯有元康四年(294年)五月匈奴郝散反叛,故“西虏寇边”当谓秦雍氐羌响应匈奴郝散叛乱。面对陇右、关中氐羌入侵秦州的危局,东羌校尉何攀先详定讨叛之策,后派遣校尉府长史杨威依策进讨叛军。但由于杨威在征战中“违攀指授”,致使讨叛失利,何攀也因此征还京师。虽然史籍所见的东羌校尉在征讨少数民族叛乱中,多以失利、被罪征还告终,但他们的积极作为仍证明东羌校尉是讨伐秦州民族叛乱,维护陇右地区稳定的重要职官。

在少数民族叛乱甫平的地区,往往需要战功卓著、威震异族的名将镇守其地,军事监护新降服的少数民族。具体到秦州,这些名将一般被授予以东羌校尉之职,这与东羌校尉管辖秦州氐、羌的基本职能是相符的。咸宁五年(279年),持续十余年的秃发树机能叛乱,被武威太守马隆率孤军三千讨平。这一在战史上近乎奇迹的胜利,为马隆赢得了巨大的声威,使威胁西平的南凉成奚部“毕隆之政,不敢为寇”。太熙元年(290年),西平太守马隆“加授东羌校尉”,“威信震于陇右”,使他在镇抚氐羌的同时,监管陇右氐、羌,稳定了陇右躁动难安的民族形势。马隆的个人威望与陇右安危关系甚密,以至朝廷欲征还马隆时,陇右“氐羌聚结,百姓惊惧”,迫使朝廷还复原职。<sup>[17]</sup>元康九年(299年)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率领禁卫军,讨平持续三年的关中氐帅齐万年叛乱。孟观在平叛中“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生擒(齐)万年”,取得了“威慑氐、羌”的声势。因此俟关中乱平,晋廷即将孟观转任东羌校尉,意在使其挟新平齐万年之功,震慑参与叛乱的陇右氐、羌各部。永康元年(300年)陇右民族动向趋于稳定后,孟观即征拜右将军,回归中央禁卫系统。<sup>[18]</sup>

## (二)东羌校尉与西晋后期秦州之争

惠帝时期持续十余年的八王之乱,使西晋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八王之乱后期,由于实力雄厚的雍凉都督河间王颙参与政争,使不少支持他的河陇官员都参与到宗王混战中。八王之乱的战火由中央波及陇右地区,凸显了秦州在西晋后期政治中的地位。在这段秦州政局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东羌校尉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太安二年(303年)始,秦州就陷入河间王颙与长沙王乂两大势力的争夺中。河间王颙以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为爪牙,围攻党于长沙王乂的秦州刺史皇甫重。永兴二年(305年)四月皇甫重战败身死,秦州全入河间王颙之手,使他掌控了对秦州地方长官的选任权。但河间王颙将秦州之任授予冯翊太守南阳张辅,却对在秦州争夺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游楷、韩稚等河陇士人酬赏不足<sup>⑥</sup>,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张辅到任后不久,东羌校尉韩稚在金城太守游楷的支持下“收兵伐辅”,败之于遮多谷口,张辅为天水故帐下督富整所杀。<sup>[19]</sup>在河陇士人联合诛杀张辅的军事行动中,由东羌校尉韩稚主导其事,这与他所任东羌校尉一职关系甚密。东羌校尉,开府置佐,领有府兵,是秦州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sup>⑦</sup>韩稚执东羌校尉府兵,于秦州诸郡长官中武力最强,拥有充足的军事实力与秦州刺史一较高下,这是他担任讨伐主力的重要

原因。

张辅之死,不仅反映了河陇士人对外来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坚决排斥,还与西晋政局演变关系密切。随着永兴二年八月东海王越起兵山东,河间王颙为其所败,势力大衰。河陇士人开始背弃河间王颙,转投东海王越阵营。如河间王颙败走长安时,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纷纷“起义讨颙”<sup>[40]</sup>。因此在河间王颙倒台,东海王越崛起的政治形势下,河陇士人通过诛杀张辅将河间王颙势力逐出秦州,亦是结好于东海王越的有效手段。张辅死后,秦国内史武威贾龛继任秦州刺史。至此,秦州刺史与东羌校尉两职全由河陇士人掌控,暂时形成了河陇士人独霸秦州的局面。

随着永嘉元年(307年)南阳王模出督雍凉,秦州再度陷入两股势力的角逐中:一方是以南阳王模为首的宗室势力,一方为以韩稚、裴苞、贯与为代表的秦州地方官员。另有近在肘腋的凉州张轨,一直暗中插手秦州事务,亦是影响秦州政局的关键人物。永嘉初,张轨“得雍州檄”,讨伐擅杀刺史的东羌校尉韩稚,韩稚迫于兵威不战而降。按张轨讨败韩稚后,南阳王模将“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作为酬报,足见张轨所得“雍州檄”当出自南阳王模,他是在南阳王模的授意下出兵秦州的。<sup>[41]</sup>南阳王模借助凉州兵力讨败东羌校尉韩稚,使秦州地方官员丧失了作为秦州重要武力的东羌校尉府兵,不仅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实力,更便于南阳王模利用东羌校尉一职,与秦州刺史裴苞争夺秦州的控制权。永嘉五年(311年)南阳王模以世子司马保任“西中郎将、东羌校尉,镇上𦰩”,旨在以东羌校尉一职为管道,将己方势力渗入秦州。裴苞识破南阳王模之计,坚拒司马保赴任。南阳王模乃出兵击败裴苞,使司马保顺利占据上𦰩。借助司马保东羌校尉之任,南阳王模实际控制了秦州部分地区,并获得陇右氐、羌的归附,为其后司马保“全有秦州之地”奠定了基础。<sup>[42]</sup>

西晋后期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频繁发生的矛盾冲突,证明东羌校尉在军事实力上是足与秦州刺史匹敌的职官。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立异,将影响秦州刺史对本州的实际掌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东羌校尉若与秦州刺史联合,有助于强化后者对秦州的控制力。永嘉六年(312年)秦州刺史裴苞与东羌校尉贯与“据险断使”,表明秦州刺史在东羌校尉的配合下,不仅能加强对秦州的掌控,甚至可以形成割据陇右之势。但由于河西张轨势力的介入,裴苞据秦州自守的状态只维持了较短时间。张轨出兵大败裴苞于狭西,裴苞奔桑扈坞,后为张轨所杀。<sup>[43]</sup>张轨兵逐裴苞,不仅打开了东进陇右的道路,还使张氏势力再度染指秦州,彰显其在河陇地区的霸主地位。

总体而言,魏晋东羌校尉的设立及发展,与陇右政局关系甚密。三国时期魏、蜀陇右之争,促使曹魏设置此官招附陇右氐、羌,争取他们对魏军陇右防御战的支持。西晋设立秦州后,东羌校尉在履行治理陇右氐、羌的基本职能外,进一步涉入秦州地方政治。特别是在西晋后期南阳王模、河陇地方官员和凉州张轨三方势力逐鹿河陇时,东羌校尉作为秦州重要的军事武力为各方势力竞相利用,在夺取秦州控制权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晋以后东羌校尉逐渐丧失稳定的建制,仅成汉、后秦等国偶有设置。南北朝时期,随着宕昌羌的崛起,东

羌校尉成为南朝授予宕昌国国王的固定官号,在官性质与魏晋相比已大异其趣。

### 注释:

①余太山指出西域都护全称为“都护西域使者校尉”(《两汉西域都护考》,《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33-257页)。也有学者反对此观点,参见李炳泉:《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第69-75页;《两汉“西域副校尉”略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第125-127页;洪涛:《汉代西域都护府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5-10页。

②胡三省根据分布地域,对东、西羌曾作出明确定义:“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资治通鉴》卷五二《汉纪四四》顺帝永和六年(141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689页)但对于这一定义,学界一直存在质疑。黄烈先生认为以分布地域难以从事实上区分东、西羌。他认为从《后汉书·西羌传》的行文叙事来看,西羌仍指原来意义上的西羌,东羌指内徙入塞的羌人(氏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页)。马长寿先生认为东羌并非其来有自,而是由两部分迁徙而来:一部分是西汉时随匈奴而来的“羌胡”之羌,一部分是东汉时从金城、陇西迁来的西羌(氏著《氏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6页)。近年来,陈琳国先生对以上三种定义予以深刻辨析,并将史籍所见东羌资料进行逐条梳理,指出胡三省对于东羌的定义是准确的,东羌并非西羌东迁而来,而是春秋战国以来就一直居住在安定、西河、上郡、北地等郡的羌人(氏著《中国北方民族史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1-144页)。本文采用陈琳国先生关于东羌的定义。

③史籍对曹魏废罢秦州的时间未有明载,只言“中间暂废”(《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秦州”,第435页)。然太和二年(228年)正月,诸葛亮出祁山,攻占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三国志》卷二七《魏书·徐懿传》载其事,称“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第739页)。此处不称秦州三郡,而言陇西三郡,推断至迟在太和二年秦州已遭废罢。

④关于晋武帝“罢州郡兵”的研究,参见唐长孺:《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废罢》,《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2-151页;高敏:《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历史演变》、《晋武帝“罢州郡兵”问题辨析》,《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17-43页、第155-169页;陈玉屏:《“晋武帝罢州郡兵说”是如何形成的》,《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第70-72页;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第160-163页。

⑤虽然史籍未载秦州刺史胡烈兼任东羌校尉,但泰始六年胡烈战败身死,即由杜预接任,除“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27页),据此推断胡烈可能兼任东羌校尉。

⑥《晋书》卷六〇《张辅传》载,河间王颙以张辅“为秦州刺史。当赴颙之难,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转梁州刺史,不之官”(第1640页)。游楷出身世为豪族的金城游氏,又担任本郡太守,集宗族及官府实力于一身,在金城积累了庞大的势力。因此梁州之任虽然是升迁,却将他逐出了势力范围金城,这是游楷不满河间王颙酬赏而不赴任的原因。

⑦东羌校尉的领兵数量史籍未有明载,可参考其他“持节领护”校尉官所领兵员数量。王万隼先生考察两晋刘宋时期南蛮校尉领兵在万人左右(《以军御蛮——两晋时期的蛮府》,《早期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27页),东羌校尉府的军队规模或与此相当。

### 参考文献:

- [1]沈小仙.古代官名的语言研究[D].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
- [2]陈琳国.中国北方民族史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42.
- [3][5][9][23]范晔.后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5:2149-2153.3517.2832-2834.3626.1869.
- [4][7][8][11][12][13]陈寿.三国志[Z].北京:中华书局,1959:777-778.472-473.60.1064.923.1090.
- [6][14][17][18][20][26][27][28][31][33][34][35][37][38][39][40][41][42][43]房玄龄等.晋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4:435.1340.430.58.1322.435.430.435.2549.435.747.1322.1027.1556.1634.1640.1622.2222.2223.1098.2225.
- [10]梁满仓.《隆中对》的政略修改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方针[J].襄樊学院学报,2008,(10).
- [15]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0.
- [16][32]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Z].贺次君,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2811.2871.
- [19][29]司马光.资治通鉴[Z].北京:中华书局,1956:2509.2591.
- [21]山口洋.西晋時代の秦州——武帝期における河西鮮卑対策[J].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1999,(23).
- [22]王夫之.读通鉴论[Z].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5:271.
- [24][36]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Z].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3.651.
- [25]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Z].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7:460.
- [30]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169.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胡成霞]